

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教育观念调整

Adjustment of Views on Education under the Challenge of Knowledge Economy

吴 华
(浙江大学教育系、副教授 杭州 310028)
罗海萍
(浙江大学教务处 杭州 310028)

一、知识经济只能诞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

近年来,“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社会经济性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各种推介、评价文章层出不穷。这使人不禁联想到 80 年代初宣传“第三次浪潮”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落实“改革、开放”国策的促进作用。而这一次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与 100 年前我国历史上的变迁对比,则“第三次浪潮”的宣传

相当于 100 年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初,注意到西方之强盛在于船坚炮利之技术,而“知识经济”之传播则相当于其后才认识到西方强盛之本在其制度,于是才有了推翻帝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制度变革实践。当然,与此类比对应的制度变迁已经发生,这就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教育方面开始发生的变化。

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社会的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其中社会的信息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可视为知识经济

高的队伍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稳定包括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一个非常好的物质支撑。物质支撑要持续地高投入,要 10 年 20 年。适当的高待遇是必要的,至少要无后顾之忧”。中科院院士、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王选教授也认为,科学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关键是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稳定优秀人才的经费。他建议:“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和稳定确有才华的少而精的人才。要把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支持到优秀人才的生活待遇上,保证家有住房,工资达到 3 000~4 000 元的月薪,要经常给他们出国机会。要在少而精的队伍中再搞竞争淘汰。”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这从我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低效率中可见一斑。1996 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和企业研究与开发总人数均列世界前 4 名,而我国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 32 位和第 21 位。如何培养、造就和稳定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营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

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 21 世纪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对任何不甘心在国际竞争中落伍的国家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较大,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势必影响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龚自珍先生曾有传世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看来现在的问题已然深了一层。“南橘北枳”的故事寓言深刻,它启示我们:当下中国的进步,制度环境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知识人口的养成,知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要取决于我们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中。所以,我愿以朱厚泽先生热烈的呼吁作为结尾:“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吗?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地推进平等竞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吧。”这是智者的共识,也是中国的希望。(责任编辑 孙立明)

的两个车轮。没有社会的信息化,知识经济就失去了市场的需求力量,知识创新也不可能得到迅速有效的利用;而没有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劳动者素质就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中生产和技术条件持续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但是,比较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对知识经济更为重要,因为无论在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的任一环节上,只有以分散决策为特征、能够充分体现个体创造性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最符合知识的本性,也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够对知识创新提供足够多样化的需求激励和充分的反馈信息。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只能诞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也只能凭借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才能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虽然知识经济目前还不是我国的经济现实,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确立已经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只是时间问题。

认识市场经济制度对知识经济的根本重要性,是我们讨论知识经济与教育改革的观念基础。目前对这个问题尚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是导致我们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为传统观念所困扰的重要原因。

二、努力增加教育投资是当前实现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制定教育政策和选择教育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但如何判断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却有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计划经济中,判断教育与经济是否协调发展主要看教育系统培养的初、中、高级专门人才是否满足了生产的需求,若满足了生产的需要就是协调发展,否则就不是协调发展。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我们对生产的人力需求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专业对口”成为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又由于在教育供给和生产需求的关系中,生产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教育发展只能选择“跟随战略”,即根据生产的需求来确定教育的规模和结构。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人力需求计划的失效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判断教育与社会是否协调发展只能根据教育系统提供的教育机会是否能够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若满足了就是协调发展,否则就不是协调发展。

由于承认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为了保持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专业不对口”和“毕业即失业”都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为了保持市场经济

活力必须付出的、可承受的代价;又由于在公众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的关系中,公众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教育发展必须、也只能选择“优先战略”,即以满公众的教育需求作为教育规模和结构选择的主要依据,至于生产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已经通过公众的需求得到体现。

比较以上在不同经济体制中对协调发展的判据,计划经济是“出口平衡论”,而市场经济是“入口平衡论”。后者不但包容了前者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全面地体现了教育的根本目标。

根据“入口平衡论”,对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就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供给在质量方面严重短缺;在高中阶段,教育供给在数量、质量两个方面严重短缺;至于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供给的短缺尤其反映在数量方面。因此,努力增加教育投资,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就是当前实现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上,有的人根据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和对今后就业形势的预测,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过度,因此应该限制和收缩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而笔者认为,第一,发展高等教育只会增加就业岗位和减轻失业压力;第二,如果不发展高等教育,失业人口照样存在,只不过失业者受教育程度降低而已;第三,一切种类的教育扩张对经济增长均有直接贡献,其界限唯受机会成本约束。详细论述以上3点涉及到对教育经济功能的重新认识。

三、教育具有直接影响经济的功能

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而有益于经济增长,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理论观点,也是政府增加教育投资的主要政策依据。但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了这一间接途径外,对经济增长还有直接影响,并且这一影响随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增加。在知识经济中,正是这种直接影响为教育的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中。

以1995年为例,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7600亿元,其中就包括了教育活动的贡献1878亿元(即当年教育经费总支出,计入GDP时需减去学生奖、助学金等项目和加上固定资产虚拟折旧等项目,两相冲抵,大致相当),约占当年GDP的3%。而美国当年GDP为72538亿美元,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34亿美元,约占GDP的7.4%,按前面同样的说明,即当年GDP中有5334亿美元由教育活动提供。

以上事实很难为国内一般公众所接受,就是在教育经济学界,也以否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为主流。究其原因,这与我国长期否认服务业(教育也是一种服务业)的生产性有关,也与我国长期沿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作为经济增长总量统计体系有关。虽然目前已经从统计体系上纠正了以往的偏狭,但是一般公众、政府官员和学术界某些人的观念中依然为以往的错误观念所禁锢。

其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中。

1995年,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系统提供了教职员工就业岗位1496万个。同时,在高中及以上学校中有学生1858万人,按劳动参与率80%计算,相当于为劳动力市场减轻就业压力1486万人,是当年失业青年人数306.8万的4.8倍。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分流作用,当年的登记失业率就不会是2.9%,而将是12%以上。结合知识经济所需的教育规模审视这一问题,其时高中已普及,普通高等学校入学率也应达15%以上,则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流作用将超过7200万(其中高中6000万,高校1200万),约占当时劳动年龄人口的1/10。

另据有关统计,1993~1994年每增百万元人民币总投资平均可增加26.7个就业机会,即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减少1个失业人口)需新增投资3.75万元,同期国有部门需新增5.65万元才能提供一个新的就业岗位。如果将等量资金用于高中阶段教育投资,则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超过8000元,用于减轻就业压力的投资效益是投入于其它部门的4~7倍。

从以上两方面对教育直接经济功能的讨论,说明了教育不但是知识经济的必要基础,而且是知识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因此,努力扩大教育规模应成为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要对策。

四、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扩大教育规模就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但政府财力有限,于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成为必然选择。

根据投资是否源于公共经费(财政性经费),学校可分为3类:公立、私立(非公立)和公私合立。结合办学主体,于是有公立公办、公立民办、公立公私合办、私立民办、私立公办、私立公私合办、公私合立公办、公私合立民办和公私合立公私合办9种学校运行模式,其中除公立公办基本依赖公共财政的投入外,其余8种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财政渠道之外的经费投入,从而开辟了增加教育投资的新方向。

从社会资源总量分析,目前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6万亿元,投资潜力非常大,关键是要有合适的政策引导。为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投资领域,必须在对我国《教育法》第二十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理解上澄清认识上的偏差,也就是不应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理解为“不可有营利的目的”。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比如我们到某地去参加学术会议,绝不会因为参观了当地的风景名胜就成为“以观光为目的”;尽管在赴会前可能就“有观光的目的”;也可能有人确是“以观光为目的”赴会,但由此作出所有参加观光的赴会人员都是“以观光为目的”,显然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正确理解《教育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意图,转变以往偏狭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国情、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规范,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投资领域,从而显著增加教育投资总量的目的将是可以预期的。

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办学主体多元化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增加教育投资这一项。它对教育改革更为深远的影响恐怕还在于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和推动了教育的产业化进程,从而使得教育体制改革朝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分散决策为特征、学校成为自主办学法人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一点只要比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市场主体多元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五、充分市场化的教育制度是教育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知识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天然地具有市场经济最为本质的内容,这是我们讨论教育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基本出发点。除此之外,由技术进步和社会信息化引起的学校信息环境的变化,将使教师角色发生重要改变,即由“主导”向“辅导”转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将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笔者坚信,一个充分市场化的教育制度是教育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学校作为独立自主的办学实体,为了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要,自然会作出比理论家所能想象的更高明的反应,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风雨历程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深刻教益。

(责任编辑 肖庆山)